

—古代名医学术懿行研究

——走近中医

◎ 周路红 著



天津出
天津人民出版社

古代名医学术懿行 研究

——走近中医

周路红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名医学术懿行研究:走近中医 / 周路红著.

天津: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13.11

ISBN 978 - 7 - 5433 - 3323 - 9

I . ①古… II . ①周… III . ①中国医药学 - 研究
IV. ①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0465 号

出 版: 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244 号

邮 政 编 码: 300192

电 话: 022 - 87894896

传 真: 022 - 87895650

网 址: www. tsttpc. com

印 刷: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本记录: 880 × 1230 32 开本 8.75 印张 20 万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问题, 可与出版社调换)

前 言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和中华文明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①。中医学之所以有辉煌的过去、持久旺盛的生命力，累积了历代医学家的智慧与辛劳；古代医学家孜孜以求、甘愿奉献的精神值得人们永久敬仰。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启了为名医作传的先河，唐代医家甘伯宗的《名医传》是我国最早的医学人物传记专著，收集自上古时代迄于唐代的名医一百二十人。古代医学家德行深厚、学识卓越、技艺精绝，成为后来学者的典范。

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中医学的影响无所不在。古代医学家的学术思想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在他们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郁气息。

本书上篇记述古代名医学术懿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论文，下篇概述古代名医学术懿行，并以史载医家传纪和医学名篇名著集中展示古代医学家的学术成就和医德修养，力图真实准确。

好友赵琼博士为本书联系出版，好友王蓓副教授为本书提供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在多年的教学中，接触到古代医家的大量资料，感慨良多，仅以此书向古代医家致敬。学养不深，文章不免粗疏肤浅，敬请同行斧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让我们以此话共勉。

作者

2013年8月19日

①吴仪

目

录

上篇	1
论古代名医的学术懿行	2
古代名医的仁爱精神	7
古代医家的科学精神	11
论朱丹溪的人格魅力和治学特点	16
徐灵胎治学特点及其文化意义	22
从《醉花窗医案》看王堉的学术造诣	28
论古医籍书名中的人文精神	32
中医古籍书名的文化意义	36
《本草纲目》与训诂学	40
《本草纲目》与《诗经》	44
《本草纲目》与诗词艺术	49
《本草纲目》与民俗学	53
基于《本草纲目》比较酒和醋的差异及文化内涵	59
《本草纲目》与咏茶诗	64
《本草纲目》对“谨和五味”饮食养生的贡献	69
《本草纲目》与《说文解字》	74
下篇	79
神医扁鹊与预防医学	80
汉代名医淳于意与诊籍	86
汉代诊脉高手郭玉	91

外科圣手华佗与运动养生	93
医圣张仲景与《伤寒论》	102
著述大家皇甫谧与《甲乙经》	110
传奇炼丹家葛洪与《肘后备急方》	119
道医陶弘景与《本草经集注》	132
药王孙思邈与医德修养	136
食疗鼻祖孟诜与《食疗本草》	147
宰辅之后王焘与《外台秘要》	150
幼科鼻祖钱乙与《小儿药证直诀》	155
河间学派创始人刘完素	166
攻邪派创始人张从正与《儒门事亲》	167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与《珍珠囊》	174
补土派代表李杲与脾胃学说	176
滋阴派创始人朱震亨与丹溪学派	184
自然科学家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215
温补派代表张介宾与水火命门说	223
清初三大家之喻昌与《寓意草》	238
侠医傅山与《傅青主女科》	246
民间教育家张志聪	249
温病学双杰叶桂与薛雪	251
医学评论家徐大椿	262

上
篇



论古代名医的学术懿行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淀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作为社会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来分析了解历代名医,能够发现古代名医的所思、所想、所行无不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名医的学术思想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精神带有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古代名医的道德理想追求

中医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充满着人间大爱,医术与仁爱有着天然的联系。相传神农氏为解救百姓夭伤之苦,找寻治病解毒良药,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后因误食“火焰子”肠断而死。神农的行为充满着仁爱,悲壮感人。仁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道德原则和人格理想,也是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古代名医用医术实践着自己的道德理想追求——仁爱。据《史记》记载:神医扁鹊医术高超,擅长各科,遍游各地,为人治病。唐代药王孙思邈主张治病救人不分尊卑贵贱、贫富亲疏、长幼美丑,都要一视同仁,如同对待亲人一样。《魏书》记载北魏名医崔或擅长医术,“性仁恕,见疾苦,好与治之”。金代医家李庆嗣曾经在大疫期间携药及米分发给病人,“天德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庆嗣携药与米分遗之,全活者众”(《金史》列传)。李杲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面对“时行疫疠”“比比至死”的惨状,“君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与服之,乃效,特寿之于木,刻揭于耳目聚众之地,用之者无不效”(《东垣老人传》)。《鄞县志》记载明代名医赵献可之子赵贞观“亦精于

注:原载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3年第11期。

医，敦厚有古风，治病不论贵贱，未尝计利。尝治人病，夜半自往叩门，候其脉证，以用药，其笃厚如此”。孝作为一种道德，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钱穆曾指出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上作用至大，地位至高，这一点在中医学上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唐代王焘曾在《外台秘要》中写道：“齐梁之间，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所以清代医学家喻昌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成为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董奉是后汉三国时代的名医，据古籍记载，董奉医德高尚，治病不取钱财，只要求治愈的病人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成林，杏子熟后，董奉把杏换成谷物，用来赈济穷人。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像他这样的医家。北宋医王庞安时对于“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药物，必愈而后遣”，救活无数的人。元代最著名的医学家朱震亨先习儒学，后改医道；素怀惠民之心是他从儒转医的重要原因，他曾感慨地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即运用医术把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实施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所以说“人的境界，即在人的行动中。”“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不论做何种事皆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人们熟知的名医文挚、华佗、皇甫谧等人在其人生的关键时刻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境界。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几千年如一日重视伦理道德的还没有第二个国家。修身克己作为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思想之一，道家、儒家、墨家都讲修身，但内容不尽相同。修身主要就是修养德行，儒家认为通过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礼”的规范，就可以达到最高的伦理道德境界——“仁”。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关键在于自己。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有不断修养内心，才能成为仁人君子。古代医家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元代著名医学家朱震

亨“执心以正，立身以诚”，“与人交，一以三纲五纪为去就”，“史称其风声气节足以激贪而厉俗”。清代杰出的医学家叶天士“居家，敦伦纪，内行修备，交朋忠信”。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平素之事亲孝，与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舆梁，见义必为”。无数的古代名医都在日常生活中默默地奉行“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道德理想。中国现代思想家马一浮先生说：“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古代名医博施广济、甘愿奉献的行为即是在践行识仁求仁好仁，说明古代名医内心深处对儒家思想道德标准的认同。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至善至美的道德理想人格对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整个中国人的深刻影响。

二、古代名医的学术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对古代名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表现在道德理想的追求上，而且体现在中医学术的研究中。中医理论来源于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及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有着重大影响。汉以后的中医融合了儒、道、佛文化的精华，儒、道共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在中医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并有所发展。“上工治未病”“邪去正安”“辨证论治”的中医学治法原理汲取了兵家思想；“因天之序”“异法方宜”的中医学生态观与农家“顺天之时”和“量地利”的言论不谋而合。中医学接受了道家重人贵生、自然无为、虚静柔顺的养生思想及其方法；佛学中修身养性、无欲无求的思想与《内经》“恬惔虚无”的养生观相一致；中医四时养生思想也渗透到中华饮食文化与岁时节俗之中。足见中医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一）古代名医学术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

中医学以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中华传统文化对古代名医学术思想的渗透也就成为必然。从《黄帝内经》受到《周易》思想影响，借用了《周易》哲学原理的思维模式开始，汉代张仲景、金元的四大家直至明清医

学家的医学研究无不受到《周易》的影响。明代的孙一奎、张介宾更被称为医易大家,张介宾还提出“医易同源”的主张。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对古代名医学思想的影响不一而足。隋代杨上善对老庄诸学十分精通,在道家养生实践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肾间命门说。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王焘在《外台秘要方》中采用了道家的导引吐纳法、养性服食法和炼丹术。丹溪学派的创始人朱震亨的“相火论”参照了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太极之理”以及《礼记》等书的意思;他创立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是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用天地日月这些自然界的现像来说明阴阳的变化;以节欲为核心的房中补益思想是医理与儒理的结合产物,与宋明理学的禁欲倾向是一致的。清代医学家徐大椿聪明过人,喜欢研究《孙子兵法》,他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提到“用药如用兵”的观点,运用类比的手法,以用兵之道来比喻临床用药之法,“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把传统兵法的智慧运用到用药之中,论述精辟,说理透彻。

(二)古代名医著作与传统文学艺术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体现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自然也是古代名医的人生理想。清代著名医学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中说:“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古代名医以不计名利、起死回生来实现立德、立功的理想,他们在“立言”方面的表现也相当出色,留给后人一万三千多种中医文献著作(现存)。这些医学著作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写作体裁不拘一格,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林林总总。金元时期的作品《药性赋》就是以赋体的形式对药性进行精辟的概括,颇受历代读者喜爱。金元时代著名针灸医家窦汉卿所写的《标幽赋》是针灸歌赋的名篇佳作。《诸家得失策》出自明代杨继洲所著《针灸大成》,采用策问体的写作形式,文章骈散结合,结构整齐匀称,以优美的文句论述了深刻的医学理论。据考,《草木传》剧本为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所写,其中

运用生、丑、旦、净等戏剧行当加以演绎,将药物人格化、情节故事化,把中药搬上了舞台,在民间流传广泛。文学著作与中医学著作在内容上相互借鉴的现象大量存在,比如明代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引用了大量的文学、史学、语言学著作内容;而古典长篇章回小说《红楼梦》也把中医药学知识融入故事情节当中。中医学与传统文学艺术的交融与渗透还表现在古代医学著作的书名上,如《儒门事亲》《养老奉亲书》《审视瑶函》《琼瑶发明神书》《棠阴本事》《方壶外史》《橘井元珠》,这些医学著作的书名采用了用典、引用、委婉等修辞手法,言辞典雅,极富文学意蕴。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富瞻深邃的中华传统文化培育了无数的古代名医,赋予了他们深厚的人文素养。古代名医的道德追求与学术研究充溢着仁爱精神,正是这种追求仁爱的精神促使他们的道德追求不断升华,他们的医学研究不断创新;从而推动了中医药学的传承和发展。如果说中医学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那么,古代名医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上培育的一朵朵奇葩。

古代名医的仁爱精神

良知与责任是以儒家哲学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的重要特性，基于良知，演化为道德责任，升华为社会责任。良知是对儒家整体价值的肯定和承诺，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善，表现为仁。仁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是道德的良知。《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仁是发自人性深处的道德醒悟和情感震撼，仁要求人们相亲相爱，反映了人对人类本质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人道精神。把“仁”作为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来要求人们，正是基于人性的本质特点；古代医学家把仁爱理解成一种社会责任，并在实际生活中用特有的方式——医术来实践这种责任。

什么是古代医家的社会责任？概括地说就是以医济人——“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张仲景《伤寒论序》）。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就是儒家思想，核心内容是“仁”。“仁”在儒家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由此核心概念展开孝悌忠信等一系列的命题。

一、良知是古代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

梁启超说：“我们这个社会，无论识字的人与不识字的人，都生长在儒家哲学的空气中”。“自孔子以来，直至于今，继续不断的，还是儒家势力最大；自士大夫以至台舆皂隶普遍崇敬的，还是儒家信仰最深”。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哲学追求的本质就是“仁”，指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的恻隐之心，不忍看别人受苦。这是“仁之端也”，发展这一端就使人自然地爱人，这是人类慈爱悲悯深厚情感的基础。由“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推而广之为对所有生命的热爱与尊重。《黄帝内经》说：“天覆地载，万物

注：原载于《光明中医》2010年第25卷第6期。

悉备，莫过于人。”人的生命最为珍贵，也就最需要人们的珍重与呵护。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中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莫逾于此，故以为名也。”认为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体现了“天地生物之心”（朱熹语），“良知真诚恻怛的万物一体之情”（王阳明语），彰显出古代医学家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崇高的精神追求。古代医家把医术称做是“仁术”，用医术来实践“仁爱”。清代著名医学家喻昌说：“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重视人的情感，笃守仁爱的本性，是人心灵深处的追求，借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人“良心的最高指令”。

从“亲亲，仁也”，“仁之实，事亲是也”，可以看出，仁爱思想是从家庭血缘亲情引申出来的；血缘的亲情之爱乃是“仁”最深沉的心理基础。“仁”作为道德情感，首先是指“爱亲”之心，由爱家人，推而至于也爱家人以外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能把这种爱亲人推广为爱所有的人，并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人类道德情感的升华。隋代医家许智藏“尝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世号名医”。明代著名医学家朱震亨因为母亲患有脾病，开始研习医学，进而精研医术、推陈出新，在医学上成就卓著。曾说“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践行了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博爱精神。

孝是爱的根本，是一切道德和爱的根源，医术与忠孝有着天然的联系。孙思邈说：“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齐梁时，不明医术者，不得为孝子”（《外台秘要·序》）。掌握医术成为忠孝的重要标志。“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孝悌是仁爱的本质，孝悌可以无限地延伸，“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于危难之际，救治百姓的痛苦。因此，医术自然也随之得以延伸。宋代医学家钱乙为皇子治疾而被提升为太医臣；明代

医学家戴思恭，“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隋唐之际的医学家许胤宗为柳太后治愈“病风不语”而拜义兴太守；清代名医徐灵胎获得两蒙圣天子蒲轮之征的荣耀。他们凭借精湛的医术成为帝王倚重的人才，担负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社会责任。

神农尝百草为“令民有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无私无畏的壮举被人们永久纪念。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小儿医，随俗为变”，其爱民如亲的拳拳之情，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被称做神医扁鹊，成为第一位在史书立传的古代医学家。孙思邈主张治病救人不分尊卑、贫富、贵贱、亲疏、长幼，都要一视同仁；甚至对贫穷的人分文不收。李杲面对“时行疫疠”“比比至死”的惨状，“君独恻然于心，废寝食，循流讨源，察标求本，制一方与服之，乃效，特寿之于木，刻揭于耳目聚众之地，用之者无不效”；不为名利，拯民于苦难的良苦用心令人钦佩。

这些典型的事例充分说明了古代医家用“以医救人”的方式来实践仁爱。“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视病人如亲人，无私奉献所有的爱心。一代又一代的医家传承着这一精神，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消除人类病痛而不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终生不渝。他们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品格、仁爱之心乃至生命，书写着人道主义和医学仁术的壮丽画卷（《为医学之圣洁和尊严》）。

二、理想是古代医家承担社会责任的支柱

“士志于道”是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信仰的集中概括。“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种承担特殊使命明晰而庄重的自我意识，主导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于是儒家追求“内圣外王”的思想，自然也影响到古代医家，成为其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内圣外王”之道，就是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进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内圣”，是指完善个人道德修养；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外王的目的。正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古代医家特别强调“内省”和“慎独”的修养方法，叶天士“居家，敦伦纪，内行修备，交朋忠信”；丹溪翁“执心以正，立身以诚”，“史称其风声气节足以激贪而厉俗”，其高尚的人格卓卓如是。“无恒德者，不可以为医”（清·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强调了医生道德修养的重要。并且“医以济世，术贵乎精”（清·吴尚先《理瀹骈文》），医术的精进同样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外王”是指外在功业，在社会上成就“博施广济”的功业，为民众带来巨大的福利。古代圣王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典范，历来都是中国人追求效法的榜样。通过内心修养成为圣人，并将其内修的“浩然之气”转化成为兼济天下的事功——即由“正心诚意”到“修身齐家”，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圣人的最高理想，也是人人心中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但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则会有不同的表现，人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来实现人生的目标。行医的宗旨是“济世活人”，这就是古代医家的最高理想，以宅心仁厚的道德修养和精妙绝伦的医术来实现以医济人的理想，以此建立“博施广济”的功业，为民众带来巨大的福利。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受到文化的制约。儒家思想文化已经渗入到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文明。医疗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也必然受其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知识理想影响与改造社会生活的积极“入世”态度，促使古代医家潜心医学，躬身行医，以医术来实现其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

古代医家的科学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然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建议取消中医的声音却不绝于耳。尽管人们对中医的学术性质至今尚未达成共识，但是中医药学不仅具有医学性质和自然科学属性，而且具有文化和哲学性质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体现了人文与科学的统一，体现了东方文化的底蕴和思维（《余靖阐述中医六大特色优势》），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我们认为废弃中医的言论是非常不理性的，也是不公正的。中医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正如吴仪所说，中医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和中华文明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辞海》的解释，“科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而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毛泽东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文中指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曾说：“求实和崇尚理性是科学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科学家在治学上必须诚实、严谨、尊重实践、忠于事实；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坚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及可知性。”

可见，科学精神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内涵，求真求实的理性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诚实敬业的献身精神等，这些都是在校大学生亟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也是其必须培养的科学素质；而古代医学家身上恰恰具备了这些精神品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其可贵之处，或许会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医有所启示。

注：原载于《中医药管理杂志》2008年16卷第8期。